

“判文”与唐代官员选拔

□ 聂永华

规则：“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选，高官少选，贤愚一贯，必合乎格者乃得铨授。”在资格范围、官资标准、资格定量、停替年限、实施对象、实施程序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这有效地保障了铨选的正常秩序，然而亦限制了优秀者脱颖而出，出现“公干强白者拘以考选，废疾老耄者得在选中”的贤愚混杂局面。于是，平判入等和科目选等补充措施随之出台。所谓“平判入等”，就是对选人所试判，分出等第，“佳者登于科第，谓之人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监，各有升降”（《通典·选举三》）。“判入高等”者所授官职多为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司经局之校书、正字等“望秩常班”。平判入等属非常铨选程序，参选者仍须受到选数、考选限制，为使卓异之才脱颖而出，就有了科目选的设置。《通典·选举三》：“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宏词，其甚拙者谓之蓝监，各有升降”（《通典·选举三》）。“判入高等”者所授官职多为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司经局之校书、正字等“望秩常班”。平判入等属非常铨选程序，参选者仍须受到选数、考选限制，为使卓异之才脱颖而出，就有了科目选的设置。《通典·选举三》：“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宏词，其甚拙者谓之蓝监，各有升降”（《通典·选举三》）。

铨试“四才”，身、言是主选者凭感觉的“印象分”，书、判尤其是判才是考察的重点。铨选试判，“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实则“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所得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土耳”。不难看出，在所体现的考试原则和才学标准中，“文学”扮演了重要角色。

吏部铨选，涉及数量庞大的新进士人和六品以下官员的选任，实际操作中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掌握选官标准，二是如何解决官阙少而选人多的矛盾。唐初，天下兵革方息，“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僧多粥少”的问题尚未突出，随着获得出仕资格者增多，“九流繁总，人随岁积”，到开元时期“大率八、九人争官一员”（《通典·选举三》）。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以“限年蹀级，不得逾越”为原则，制定“循资格”的铨选

判文水平高低评价“官人”能力大小，成为一种时尚。《旧唐书·杜审言传》：“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吾吾判，即自当生死矣！……其矜诞如此。”杜审言“恃才矜傲”，所“矜诞”者即为判文。

判文不仅在铨选中举足轻重，也是行政活动中影响“官人”能力与政绩的重要因素。《大唐新语》卷八：“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俊怪之。……他日，崇俊召入，劾而贵之。琰之出同州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平常铨选程序，参选者仍须受到选数、考选限制，为使卓异之才脱颖而出，就有了科目选的设置。《通典·选举三》：“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宏词，其甚拙者谓之蓝监，各有升降”（《通典·选举三》）。

吏部铨试“四才”，书判远比身言重要。这首先体现在铨选程序上。《通典·选举三》：“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其次具体操作过程中，体魄、言辞的考察流于形式，事实上吏部铨选并不以貌取人，为考官中不乏身、言不佳者。“书”通过判文的墨迹考核，所谓“吏部选人，必限书判”，实则仅限于“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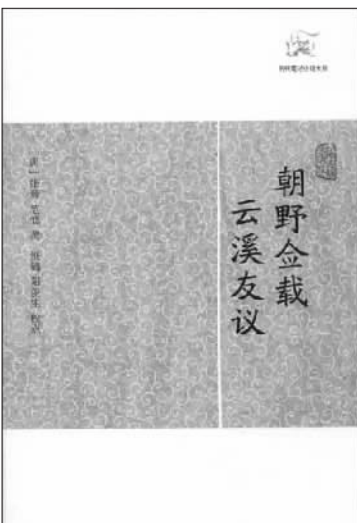
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则才可知矣。（赵匡《选举议》）由于判文与仕途攸关，

判、案判和杂判三类。拟判是为准备铨试的“练笔”之作，所涉案例用天干分别代表当事双方，故又称“甲乙判”；案判是官员在处理案件或公务时所作；杂判是公务之余，就日常生活事件的有感而发。

吏部铨选试判，意在考核选人“临政治民”的吏事能力，然而唐人判词大多辞藻华丽，试判要求“文理优长”，实则“文”显而“理”隐，乃至“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殊异”，故有“不切于从政”的指责。实际上，唐代判文的这些特征，既是文体自身发展规律与文学风尚的表现，也与唐代官员“高雅”的品格有关。“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制度的“指挥棒”下，朝野上下“读书善文”，塑造了一个“学习型”的社会。

随着文化积累的丰厚和人文素质的提升，试判也“水涨船高”，难度愈来愈大。吏部试判由“理”而“文”到“文理”兼优，经历大致三个阶段：试判之初，“取州县案牘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日月浸久，选人应试技巧提高，暴露出“案牘浅近”之弊，于是“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经籍为选人所长，“通经正籍”又显浅近，于是“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判目愈来愈难，案例亦由真实变为虚拟。

现存唐人判文，多为拟判，未著者姓氏，仅有张鷟《龙筋凤髓判》和白居易《百道判》（一名《甲乙判》）留存。张鷟先后四次参选，判为铨府之最，才名远播，无贤不肖，皆诵其文，万篇中，有“青钱学士”之誉；白居易“百道判”为应书判拔萃科的备考之作，白氏尝云：“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私试赋判传为标准的。”（《与元九书》）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百判（《龙筋凤髓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白乐天《甲乙判》则读之愈多，使人不



资料图片

厌。……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经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钱学士’所能及也。”张判中有人名、官称、法司等，判目多出真实案例，判文内容与律令相关。白判则“假设甲乙”，判目多出经籍，案例多为虚拟。实际上，二判均为“取备程式之用，则本为隶事而作，不为定律而作”的拟判，从文体和文辞特征而言，同为四六骈体，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用典赡洽。张判典实繁缛，极力铺陈，白判用典较为浅切，文辞简要。其间异同，自是唐代“文学”演进阶段特征之表现，所谓“居易判主流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铨选试判强调“文理优长”，实则“文”的讲究超过“法”的运用和“事”的分析，成为无异于“诗赋”的“文学”。

唐代“官人”于官场内外有感而发的杂判，骈词俪句，笔致灵动，诙谐幽默，颇似美文小品。元稹有杂判18道，如《对谿客鱼判》《对养鸡猪判》《千年龟判》《对宴客鳖小判》等，显然是公余宴饮之际的游戏之笔，调笑而不失优雅，谐谑而不浮薄，以见其端绪勤恪的朝堂官衙之外，唐代“官人”休沐闲暇之际清旷飘逸、潇洒闲适，呈现出仪态优雅之“文官”风采。

判文伴随唐代“官人”为官生涯的始终，集学问见识、分析能力与语言表达于一体，熔“立功”与“立言”、实用性之与文学性于一炉。铨选试判的制度导向，判词进入“官人”的精神生活，与礼部科举“以诗赋取士”相呼应，造就盛世发达的政治文化，成就了优雅的人文环境与人文生活。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资

问祖炎帝 寻根高平

海峡两岸同胞共祭神农炎帝

5月3日上午，丁酉年四月初八，神农炎帝诞辰吉日，“问祖炎帝·寻根高平”丁酉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民间拜祖典礼在高平神农炎帝大殿广场隆重举行。6000多名当地民众与专程前来拜祖的600余名台湾同胞，齐聚炎帝故里，同拜华夏人文始祖，共祈中华民族复兴。

据专家学者考证，高平神农炎帝历史遗存密集，碑石刻翔实，民间祭祀活动源远流长，史书记载和故事传说丰富，历史文脉清晰。近年来，高平在挖掘和传承神农炎帝文化上持之以恒、坚持不懈，“问祖炎帝·寻根高平”成为海峡两岸交流的主题。

此次民间拜祖典礼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山西省台湾事务办公室、晋城市委、市政府主办，台湾中华神农炎帝协进会等单位协办。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来自台湾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新党主席郁慕明，全国台联党组书记王毅夫，山西省省长楼阳生等参加拜祖典礼。（刘乡英）

中国古建筑的数理意蕴

□ 李玲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化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外化融入到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气象、天文、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于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平衡、吉祥、美满和等价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传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也就是办公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且特以九、六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为阳，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幸福、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味，中国古代表有“九重天”之意，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数字“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坛面石块、栏板数日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的、龙凤呈祥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

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东西两侧为东六宫、西六宫，大多用了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内廷多用偶数，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因而借助与上下四方即天地相合的建筑数字用以满足天地护佑、和谐共生、祈福求祥的期盼。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阴阳学家提出了“天圆地方”学说，认为大地的格局是四方形，而“四”这个数字又被赋予了“边界”“界限”的意味。进入乔家大院的大门，一条八十米长的石铺笔直的甬道，以“八”数定长度以求“四平八稳”，不与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相契合，也暗含着四通八达、和谐圆满之意。北京四合院中的“四”为“四方”，象征“地方”；“合”为“闭合”，象征“天圆”。这一由“四”所表征的建筑符号呈现出有方有圆、有阴有阳的直观意义，却无不暗合着阴阳和谐、天地合一之意。可以想见，北京四合院正是借助于“四”这个数字的形象所指，表达了祈求圆满的美好愿望。北京天坛作为大型的祭祀场所，其作用是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永定门城楼

资料图片

而其建筑构成上的数字都暗合一年四季、日月星辰的数目，以求得实现与天地和谐、得天地护佑的愿望。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乾卦第一》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帝的权威；“五”不仅来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官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合“九五”至尊的意思；太和殿巨柱高擎屋顶，为故宫中最重要的宫殿，其建筑构件之数量多取象征阳性的奇数，尤其力求九或九的倍数，力图用数的意象象征并宣扬等级性。

北京天坛之圜丘作为祭天的场所，其几何尺寸更是严格采用九数。圜丘中央砌一圆形石板，称“太极石”。此石四周砌九块扇形石板，构成第一重；第二重砌十八块，第三重砌二十七块……直到九重为八十一块，都为九的倍数，目的是在不断

重复强调“九”数的意义。天坛祈年殿从台明到宝顶全高为31.78米，合清代营造尺寸九丈九尺九寸。进一步扩展开来看，北京城中轴线从永定门、太和殿、钟鼓楼依次为九里、五里、一里，共十五里长。传说我国上古行政区域有九个，是为“九州”，因此现在也有用“九州”代表中国。这些数字在建筑中的运用，体现了我国古建筑文化的价值追求。

中国自三代社会，建筑就在类型、尺寸、数量和色彩等方面体现出“礼”的要求。无论是中国传统单体建筑还是建筑群，其空间形态和规格常用数字做出等级划分。《礼记》规定“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于是建筑的台阶高低也成了等级制度的载体。中国古建筑的等级制突出地表现在间架数字化追求上，唐代《营缮令》规定：“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四、五品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门屋不得过三间四架；六、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可见，不同级别的官员能拥有的“间”“架”数量有着严格的区分。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

巴蜀传统村落，是指古代巴蜀地区保存下来，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至今为人们服务的村落。它承载着巴蜀文明的历史遗存，维系着巴蜀文化的根脉，是人、物、历史与传统文化的高度统一体。巴蜀传统村落保护，对于推进巴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增强巴蜀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促进巴蜀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和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宗自古出西蜀。”巴蜀历代人才辈出，群星闪耀。结合传统村落的保护，实施名人工程，让名人接地气，为乡贤传美名，往往事半功倍。古代乡贤致仕还乡，著书治学，修身育人，风化乡间，起到了涵养文气、集聚人气的的作用，客观上强化了巴蜀传统村落的根基。此外，实施名人工程，也应该发挥现代乡贤的作用，包括德高望重，为家乡作出贡献的乡贤乡老，以及从传统村落走出去，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名流，请他们为传统村落保护献计献策。尊重和礼聘乡贤，争取乡贤返乡，重构传统乡村文化，也是传统村落保护的有效方式。

乡村匠人是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其本质是掌握了一技之长的农民，对于家乡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因为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越来越逼仄，匠人群体的流失也越来越严重。巴蜀传统村落保护，难点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的重构。留住匠人，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地保护，原味展示，活态传承。通过大数据、大数据、传播匠人文化，弘扬匠人精神，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匠人一出，便知有没有。巴蜀传统村落的活化，关键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在传统村落的余晖里，执着的是匠人，出彩的也是匠人。

农民是传统村落的主人，为了生计，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被看作现代社会变迁的缩影。随着与语言表达于一体，熔“立功”与“立言”、实用性之与文学性于一炉。铨选试判的制度导向，判词进入“官人”的精神生活，与礼部科举“以诗赋取士”相呼应，造就盛世发达的政治文化，成就了优雅的人文环境与人文生活。（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有机组成部分。巴蜀传统村落，不少分布在高山峡谷间，曲径通幽处，揽日月之精华，聚天地之灵气。巴蜀传统村落保护，也要建立体现生态文明的目标体系。通过生态建设，夯实传统村落保护的基础，通过传统村落自然生态的保护，深化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内涵，其目的要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留住乡愁。宋代文豪苏轼的一首《满庭芳》，唤醒了万千巴蜀游子的乡愁：“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令苏轼魂牵梦萦的是故乡的岷江与峨山。而在他所处的宋代，岷江还被视作长江的正源，峨眉山也是川南当之无愧的生态屏障。这看似巧合，却蕴含着一个道理：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保护好传统村落，才能留住和寄托我们的乡愁。

巴蜀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并不平衡，在川西、川南、渝中以凝聚型分布为主，形成彼此联系的传统村落区域。著名作家、艺术家冯骥才把建立古村落保护区作为传统村落保护的新方法，并作出如下界定：“古村落保护区，又称‘古村落群’，就是将一定区域内形态相同、人文相关的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形成一个家园化历史群落。”在川西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这种保护方法符合历史实际且行之有效。例如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就有中查村、大城村、大寨村、苗州村、下草地村、大录村、东北村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形成了与旅游产业良性互动的传统村落保护区。巴蜀传统村落保护，应该在政府主导下，整合资源，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区建设。而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区，对于那些具有一定历史文化资源，却没有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的保护，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在川渝以东、川北入陕地区，传统村落以均匀型分布为主，有的依山依水而蜿蜒，有的随山脉起伏，还有的沿古官道、古商道、民族走廊分布，与古道、古驿、古寨、古镇相伴生，有着美丽的风景线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四川雅安名山县的朱场村、荣经县的新添村、汉源县的民主村、天全县的红星村等，沿茶马古道分布，多为明清时期的古驿站、小店铺，完全可以将它们贯穿起来，可以形成保护的文化线路，也可以打造旅游精品线路。建议地方政府联动，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开发传统村落保护线路，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随着保护的不断深入，建议向东部三峡库区、西部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纵深发展，结合民生工程、扶贫工程，促进传统村落之间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动与共享，让传统村落保护工程深入民心。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